

近期散文创作的三个亮点

□古 耙

过去这一年中国文坛的散文创作,我们无须讳言它存在的某些问题与缺失,但更要看到它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一大批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依然专注而痴情地仰望精神的星空,坚持进行着既呵护心灵又滋养社会,既立足当下又不弃传统艺术追求,在我看来,出自他们笔下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凭着丰厚的人文内涵、精美的艺术表达,以及积极大胆的探索精神,不仅支撑起了2009年散文创作的整体厚度与高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期散文创作的独特景观与个性亮点,国庆散文、历史文化散文、乡土散文硕果不断,喜获丰收,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历史与美学价值。以下,就我个人的视角和阅读感受,归纳出近期三类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以供讨论。

国庆散文: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生命思考相互融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是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构成了该年度散文创作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主题,要把这样一个重大主题转化为一系列灵动鲜活、质文兼备的散文本,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过去我们读同类作品所留下的印象,便常是思维大于形象或理念压倒文字。令人欣喜的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出现的一批散文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同类作品常见的缺憾与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充盈着新质与新变的审美风貌,以及由此产生的较强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其中有两种创作取向值得总结与肯定。

首先是个个人经验对宏大叙事的自觉介入与有机融合。以散文的形式切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话题,无疑属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范式,近乎天然地追求着社会含量的丰厚与精神指向的高迈。不过,许多作家已不满足于抒发空泛的国家情怀,而是注重以清醒的历史意识为导引,精心选择生命经验中那些牵动着时代风云的事件或场景,作为切入历史的契机,进而展开高度个人化和心灵化的讲述。不妨读林非的《渡过长江去》(《《人民日报》5月23日)、肖凤的《战火,擦肩而过》(《北京晚报》4月13日)、尧山壁的《志愿军哥哥》(《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和冯晓丽的《婆婆的接收北平记忆》(《人民文学》第10期)。这几篇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笔墨对准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渡江战役、北平解放、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虽然经过多种文艺样式的一再搬演,早已脉络清晰、意义彰显,然而当它们进入上述作品的叙事空间,却由于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融入了记忆中储存的表象、思绪与情感等等,所以其画面和氛围不仅立见新鲜、活潑和真切,而且平生发出一种信史植根于世道人心的深远意味。贾平凹的《从棧花到西安》(《人民文学》第10期)、袁山山的《且看车轮滚滚》(《海燕·都市美文》第12期)和毕星星的《在乡下坐公共汽车》(《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同样是以个人经验折射国家风貌的作品。这些作品所依赖的个人经验不仅更加单纯具体,而且融入了世俗生存,书写的或是回家路途的今非昔比,或是交通工具的兴衰替代,或是乡下乘车的新鲜感受。然而,就是这些俗世经验告诉人们,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并非单单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提升与巨大改观,正因为如此,它值得我们献上由衷的热爱和祝福。在喜迎新中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贺龙元帅之女、将军作家贺捷生一连写出了《故里桑植魂归》(《人民日报》8月1日)、《仰望国旗》(《光明日报》

9月24日)等多篇抚今追昔的散文。这些作品时空遼远、背景开阔,但笔力最为集中也最见情致的是早已铭刻于作家心中的两个方面:父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家乡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家乡人民包括许多前辈亲人为革命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显然,这也是个人视角支撑起的宏大叙事。它不仅透过一个家族和一方红土展现了中国革命的神圣与悲壮,而且很自然地揭示了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力量所在;执政党以其先进性和廉洁性,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恒久的血肉联系。

其次是独立思考对历史空间的深入拓展与强力支撑。新中国走过的六十年,既是辉煌壮丽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种历史进程的“复调性”,使得许多作家在以散文回顾新中国往事时,不再只是简单的讴歌,而是在讴歌中掺进了必要的反思与内省。且看王蒙的《歌声涌动六十年》(《《人民日报》8月26日)。这篇作品以新中国成立后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为线索展开作家的记忆,其穿越时空的讲述,固然不无万象更新、继往开来的豪情,但也不时穿插着补偏救弊的哲思警句,使一个共产党员的国家情怀趋于深沉和立体。乔忠延的《虎头山上的灵魂》(《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从留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贾进财、孙谦、郭沫若等人的坟墓说起,通过梳理和评价这些人生前与大眾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寨精神,同时也是对新中国命运的一次辩证解读,其中饱含的悲壮与苦涩,因为更接近历史的本真而越发具有感人的力量。袁鹰的《天安门见证》(《人民日报》4月29日)和张守仁的《从无我到有我》(《《文艺报》7月18日),都是集深情与深思于一体的篇章,它们一边陈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边清理历史的疾患与旋流,努力让读者在对比与变化中走向时代的纵深思考。而梁衡的《周恩来为什么不倒》(《海燕·都市美文》第7期)、司徒杰的《拜谒韶山》(《广州文艺》增刊第2期)等,则立足更为宏阔的背景展开有关历史大事件和大趋势的思辨,其种种说法尽管未必都是定论,但却足以让人感受到建国大业的风云变幻和任重道远,进而确立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

历史文化散文:精神追寻与文体实验齐头并进

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文化散文,经历了十年左右的轰动与火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趋疏淡与沉稳,总体上呈现出调整、积蓄与酝酿的态势,这种态势遵循着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最终形成了创作上的新一轮冲刺与喷发,一系列精神高蹈和艺术精致的文本,不仅为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而且又一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

纵观2009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一些学养丰厚、准备充足的老中青作家,推出了一批立意、行文新颖,显示着潜潜与进取精神的出色篇章。如熊召政连载于《美文》杂志的“明朝帝王师”系列,李国文连载于《文学自由谈》杂志的透视文人与文学系列,车延高连载于《十月》杂志的“醉眼看李白”系列,以及乔忠延的《记忆李自成》(《散文海外版》第4期)、谢宗玉的《阮籍三哭》(《随笔》第2期)、杨闻宇的《萧何后十年》(《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刘慧儒的《〈后出师表〉的尴尬》(《读书》第9期)、陈启文写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那一袭洗得发白的长衫》(《广州文艺》第1期)、李元洛写大文人苏东坡的《生死两西湖》(《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冯伟伟写湖南名臣胡林翼的《擎天》(《

■ 评 论

从一份报纸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蒋原伦

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这一瓢当头凉水泼下来并不能立即收效,想想当年的年轻人求偶,征婚启事会上自己如何如何热爱文学,也希望钟情文学的人能成为其配偶,足见文学的魅力。文学大概是除物质生活外,所有精神生活的寄托(这也是今天浸泡在网络世界中的年轻人难以想见的)。其时不仅文学还延续着轰动效应,而且连带着《文艺报》也有了效应,那时《文艺报》受中国作协委托主持的文学大奖评奖活动和获奖名单,会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显赫位置上,经《文艺报》品评的文学作品似也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效果。据说是有的作者其作品得到《文艺报》的褒奖,不仅可以调动或重新安排,户口是农村的甚至还有农转非的可能。当然后来形势陡转,文学降温,既是意料之中的,更有意料之外。

回到魏宝涛的著作上,《文艺报》最有轰动效应、一言九鼎的时代就是宝涛所

(《散文海外版》第6期)等。而在全年度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最见思想光彩与艺术功力,同时也最能反映这类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成就的,则是几位实力作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辛勤笔耕,最终推出的散文专著。它们是张炜的《芳心似火》、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王充国的《张学良人格图谱》、钱红莉的《诗经别意》,以及王芸的《穿越历史的楚风》。

张炜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善思者,他的思想触须一方面植根于脚下的自然与大地,另一方面则伸向了心中的历史与经典。长篇散文《芳心似火》正是作家在后一方面覃思笃悟、孜孜以求的结晶。这部作品先将齐文化和鲁文化加以区分,凸显了齐文化特有的物欲勃发、风流倜傥;然后又在齐文化与严刑峻法、专制高压的秦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既道出了二者的存在不同,更揭示了它们的异中有同;接下来则全回避地指出了这两种文化的殊途同归和最终沉沦。这时,齐、秦文化由盛而衰的种种原因,无形中变成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前车之鉴;而被它们共同忽视的东西——思想的积累、道德的承传、知识的延续,还有对一颗“芳心”即爱心的呵护与弘扬,则幻化为作家面向人类未来的苦心叮咛与殷切期盼。

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常常联系着宗教和底层,但也从不忽视历史。如果说问世于1990年的《心灵史》更多凝聚着作家的激情与强悍,那么新著《敬重与惜别》已将这种激情与强悍纳入了深邃与博大。这部作品以两百年来世界风云变幻为特定背景,别具只眼地解剖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和群体,同时也细致入微地梳理和分析着中日关系史上复杂多元的政治恩怨、军事冲突和文化纠葛。其中透过人物命运、典型场景乃至具体细节所呼唤的历史大义、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固然振聋发聩,启人心智;而那些在两个国家和民族、两种文化和文本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反差、错位与裂缝,又何尝不让人思路另开,视野敞亮。

王充国一向主张用散文激活历史,同时用历史滋养散文。他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亦复如此,只是在既定的价值取向上,这部作品分明寄寓了作家更为独特和高准的艺术追求,他调动散文可以调动的一切表现手段,以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散点透视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功臣张学良写照,围绕这一根本意旨,作品一方面在史料丛林里广征博引,取精用弘,以披露主人公面对历史激流的心理逻辑与人格特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命运之谜;另一方面则把小说、诗歌、戏剧以及影视的技巧和元素积极引入散文的空间,以此营造丰腴而新颖的表现效果。

带着一卷读画随笔涉足历史文化散文的钱红莉,于数年前经营起《诗经别意》的大题目,她另辟蹊径,让自己的岁月印痕和生命储存大胆进入《诗经》的世界,用一个聪颖机敏的女子所擅长的感觉、体验、灵思和想象,同古人笔下的文学经典展开对话。这样,一部《诗经》果真有了丰沛的“别意”,同时也有了常说常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青年女作家王芸的《穿越历史的楚风》,在历史积淀丰厚且密集的精楚大地上荡开笔墨,驰骋才思。其字里行间固然不无对地域文化遗产和古人精神气质的深入追溯与准确把握,更见苦心孤诣和卓尔不群的,则是新颖别致的文体形态与叙事策略。作家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用发散性与过滤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提炼出对象的代表性特征或意象,然后以此为核心展开简洁的大写意式的历史叙事,让富有弹性与韵味的艺术语言构成畅达自足的文本,呈现主客观的全部内涵,而将必要的史料依据转化为画外音式的背景提示,放在文末。这时,一部《穿越历史的楚风》

留给历史文化散文的,便不仅是异样的结构方式,同时还有积极的探索精神。

乡土散文:多元表现与客观审视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贯穿着都市与乡村的复杂纠葛与矛盾运动,所以回望乡关、抚摸田园,一直是新时期和新世纪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过去的一年里,乡土题材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它的基本创作路向却出现了新的拓展与探索。

首先,面对乡土田园,一些作家不满于概念化、浅表化的书写,而试图加以立体多元的开发与表现。譬如,陈启文的《河床,在时间的岁月中》(《作品》第3期)、李清明的“天蓝水远”系列(见散文集《寥廓江天》),均多层次地倾吐着作家的乡土经验,使一种浑圆、厚重和斑驳的水乡景观跃然纸间。刘醒龙的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以生养作家的鄂东乡村为圆心,做大跨度的时空辐射,其缤纷摇曳的艺术触须,牵引出浸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信息的社会场景与人物光影,使你看到了一个美丑交织、爱恨同在、苍茫混沌的乡土世界。阎连科的《我与父辈》(《钟山》第2期)也是一部回眸乡土的力作。散文通过讲述“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一家”“我的四叔”,极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地展现了中国农民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其字里行间负载的种种艰辛与欢愉、沉重与温馨、敬畏与悲悯、忏悔与询问,都植根于作家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乡土经验。

其次,一些作家开始用相对理性的态度,客观冷静地审视乡村大地和农民生活,努力完成生命意义的辨识和文化价值的扬弃。如周佩虹的散文集《我的乡土记忆》,让作家的心灵重返当年的知青现场,用一种自由、内敛且又舒展、沉静 的笔触,勾画已经逝去的乡村风景,小心翼翼 地呈现大时代之下的小物象。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有部分文字涉及作家的乡土记忆,其中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细节鲜活隽永,而由作家站在今天的精神高度作出的关于一代人乡土情感的辩证分析,则尤其令人冥思和回味。周晓枫的散文并不以乡土书写见长,但一篇《纸里的乡村》(《《人民文学》第11期)针对当下的乡村书写展开再书写,其中不少见解确实启人心智。江西作家刘华近年来致力于多卷本系列散文“大地脸谱”的创作,旨在从民间文化的层面切入乡村和田野,其中出版于2009年的《百姓的祠堂》(亲切的神灵》(风水的村庄》等卷,将艺术瞳孔依次聚焦于乡间的祠堂、面具和风水,由此展开的叙述不仅有声有色,而且人情入理,这无疑为散文的乡土书写开辟了新的有益的路径。

总结近期的散文创作,三大亮点固然构成了成绩的主流,但毕竟不是成绩的全部。在亮点的光照之外,仍有一些质文俱佳的作品熠熠生辉,显示着思想、情感和审美力量,这类作品至少包括:余秋雨悼念晋晋的《门孔》(《收获》第1期),史铁生表达意识流动的《诚实与善思》(《人民文学》第10期),王开岭直面当下世道人心的《现代人的江湖》(《海燕·都市美文》第9期),刘心武追怀亡妻的《那边多美呀!》(《上海文学》第7期),南帆将理论散文化的《关于一部虚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海燕·都市美文》第8期),梁晓声的《谢铁骊印象》(《海燕·都市美文》第1期),朱以撒缅怀恩师俞元龙的《像潮水一样漫过》(《散文》第9期)等,倘若说到这一年出现的散文新人,新疆的李娟和甘肃的刘梅花无疑值得关注,她们发表的一些作品,大都传递出健康的审美意趣与良好的文学潜质。

展历史面及其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梳理”。

该书最有创意的地方是揭示了《文艺报》参与了十七年文学经典样板的建构和关于那一代文化人“检讨书”规范的建立和示范传播这两个部分。特别是后一部分,涉及作家的自我思想改造,涉及到作家、文学家、文化人的思考环境和文化生态,使今天的人们认识到历史进程的严峻性。这里的关键不是文化人要不要检讨自身,而是对这一检讨所造成的思想窒息,应该有所认识和警醒。本书正是从文体和写作层面这样一个视角探入,并予以深刻揭示的。那些检讨书,不管是以编者按、编委会,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均体现了那时统一的思想改造的严密程度和控制力度。现在,当历史远去,我们才能有心情来审视所谓的检讨书文体及其所确立的规范,并从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那段不堪回首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

今天《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仍然发挥着扶植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研究、繁荣文艺的重要作用,虽然没有了当年横扫千军的雄风和威严,倒是有了颇为亲切的面孔。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还是媒介多元的原因,一张报纸一言九鼎的范范的逝去,毕竟是时代进步。作为当年《文艺报》的记者和编辑,我乐见有宝涛这样的学术著作的面世。

■ 关 注

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运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都与此有关。另外一个 是充满人生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表示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萧乾所说,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但是,萧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待他人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还是多年以前,萧乾先生 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老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鹇。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 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三 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洁若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他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若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火,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五 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4年春夏之际,忽然接到萧乾给我的一封信。信不长,意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坎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浩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来看笑话”。接信后,我和商容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里,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翻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千就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好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利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萧乾对翻译工作本身评价并不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不搞创作。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很不公平。”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因为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给人留下话柄。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对别人会如何评价自己、如何对自己进行历史定位有着强烈的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文学史著作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其心态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萧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他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和‘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传统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形势“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在大小批判会上受到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到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狂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启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做了反驳。也有自我期待时,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过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罗嗦,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大又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感到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轻人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不安定。这就是萧乾十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无憾告别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事实上上,在他那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变化。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头一尾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八十岁以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思维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十 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信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作品常伴我们,他为自己贏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

本版责编:刘 頔 饶 翔

萧乾：如何尽显生命奇迹

□丁亚平